

人、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KENNETH N. WALTZ

[美] 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人、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KENNETH N. WALTZ

[美] 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 强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美)肯尼思·
华尔兹(Kenneth N. Waltz)著；信强译. —2版.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ISBN 978-7-208-15673-9

I. ①人… II. ①肯… ②信… III. ①国际政治关系
—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7319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人、国家与战争

——一种理论分析

[美]肯尼思·华尔兹 著

信强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198,000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2 版

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73-9/D·3361

定价 52.00 元

推 荐 序

人类无疑渴望拥有和平,但是为什么和平的梦想却一再被战争无情地击碎?这不仅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恒久的研究主题,也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苦苦求索的命题。战争的根源何在?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谓众说纷纭;与之相应,人们所开出的“和平处方”也歧见纷呈,莫衷一是。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教授撰写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对战争根源这一历史谜题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理探讨。

该书是华尔兹教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自1959年付梓面世以来便备受学界的推崇,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部经久不衰的必读经典。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甚至在《美国政治科学:国际关系》(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文中将之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雷蒙·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并称,誉之为“有史以来国际政治的三部最好作品之一”。平心而论,这并非是过誉的溢美之词。

在该书中,华尔兹教授旁征博引,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了西方文明史中一系列经典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并且结合大量现代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观点,集中探讨了“什么是战争的主要根源”这一核心问题。华尔兹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战争根源的认知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源自人本身,即人性的邪恶;源自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形式;源自国家体系。华尔兹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称为关于国际关系的三种“意

象”，并对每种意象的代表性观点及其政策意涵逐一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在他看来，无论人性是善抑或是恶，国家政体是民主抑或是专制，由于国际间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即在众多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之上并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国家间的利益不可能实现自动的和谐，那么战争作为国家之间争端的最最终仲裁手段，永远都将不可避免或不可被消除。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较之于此前诸多彪炳史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华尔兹并没有陷入片面强调或者夸大某一种意象作用的窠臼，而是得出了如下“更具包容性”的结论：第三种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的体系，但是如果没有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我们就无法了解决定政策的各种力量；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但是如果没有第三种意象，我们就不可能评估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是预测它们将导致的结果。三种意象各有侧重，但又彼此相辅相成，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对千变万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形成系统全面的正确认知。

《人、国家与战争》一书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对于战争根源问题的缜密思考和论证，而且还在于其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上的独到创新。面对纷繁复杂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关于战争根源的众多观点，华尔兹教授匠心独具地归纳出了三种“意象”，而这三种“意象”所分别指向的人、国家与国际系统，无疑就是三个明确无误的国际关系分析层次。在该书出版后一年，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发表《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文，从方法论意义上对层次分析法的作用进行了详细阐发和论述。由于该方法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定位”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变量，进而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自问世以来便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被视为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之一，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系统化”和“科学化”。而正是由于华尔兹和辛格两人对该方法的应用和推广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层次分析法也因此被誉为“华尔兹—辛格研究方法”(Waltz-Singer Approach)。

在1991年，我曾与林至敏和王建伟两位年轻学者合作，首次将《人、国家与战争》一书翻译成中文，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该译本颇受欢迎，但囿于水平，译文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此后一段时

间,我们一直想能有机会修订再版。然而,忙忙碌碌,没能如愿。直到不久前,信强教授告知,他将重译此书,我不仅全力支持,而且感到欣喜万分。信强是我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埋头苦读,勤于思考,学风踏实,文风严谨。早在2003年,他便翻译出版了华尔兹教授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这些年来,他勤奋耕耘,硕果累累,不断进取,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影响日隆的青年学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为信强在各方面超越前辈而感到骄傲和欣慰。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为了做到精益求精,信强不仅与华尔兹教授始终保持着经常性的交流和沟通,并且利用在哈佛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的机会,专程赶赴纽约,在华尔兹教授的家中盘桓数日,就书中一些词句(据我所知至少有一百余处)的含义当面向华尔兹教授本人请教和求证,以求能够尽量准确无误地传达华尔兹教授在本书中所希望表达的观点和思想。这种虚心求教的态度和学风值得发扬。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本用心推敲,精心琢磨的译著,我万分为其出版写下这些文字。

是为序。

倪世雄

2012年5月30日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文版前言

《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最初的标题是“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中的人、国家以及国家体系”，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书名，但却是一个不错的博士论文的标题。对于该论文的论点以及基本的推论逻辑，直至今日，我也从未发生过任何动摇。

当我突然不得不接受一位始料未及的国际关系专业——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副修领域——的答辩教授的询问时，本书的论点得以形成。我原本以为将要面对的答辩教授是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但是由于他身体有恙，因此由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教授临时接替他的工作。福克斯教授否决了我和佩弗教授关于论文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亦即只论述国际关系的某些方面，而将另一些方面束之高阁。当时距离答辩日期只剩三周的时间，同时由于陆军正在一心盘算着再次把我征召入伍，所以我也不可能推迟此次答辩，为此我和我妻子阅读整理了所有从宏观视角论述国际关系的书籍。感谢上帝，那时这方面的书籍要远远少于现在。下一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些论述。

有了问题才会有答案。撰写的书籍反映了作者的倾向。有些人在人性中发现了战争的根源，有些人在国家的构成形式中发现了战争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在国家体系的特性中发现了战争的根源。学者专家著书立说，对国际关系展开研究，对于到哪里去寻找战争与和平的根源，他们往往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他们之间的许多意见分歧也均植根于此。

随着问题被明确地提出，以及对答案的搜集逐渐展开，论文的撰写几

乎(对此我绝无夸张之意)其乐无穷。我将一半的时间用于论文的写作,从头至尾共用去了14个月的时间。在此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将论文编撰为书稿所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事实上,这用去了我四年的时光。书稿于1958年秋季交予出版社,而该书则于一年后得以面世。为什么会用去了四年时间呢?答案只有两个字:教学。教学工作可以占用掉你愿意给予它的全部时间。

我希望从事教学,并为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完成硕士学位的工作之后(但我还未能获得该学位),在我最喜爱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本科生教授(以及我最喜爱的教授妻子)的敦促下,我重返奥柏林学院,教授两门关于美国政府的课程,外加一门关于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课程,并且与他人合作主持一个高级研讨班。我曾经学过一学期的关于美国政府的课程,但却从未上过任何有关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课程。我曾经报名参加一个这方面(国际法)的课程,但是很快便退出了,因为我发现这一主题所涉无关宏旨。在我妻子的大力帮助下(她对美国政府的了解要比我深入透彻得多),我步履维艰地度过了第一个学期。但是我依然十分享受教学的乐趣,尤其是当学期行将结束之际,我终于得到一个以上的教学任务时更是如此。

关于我的自传已经说得够多了,或者是太多了。现在应该开始专心阅读了。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书,因为当你在阅读那些你喜欢的书籍时,你最容易从中学到知识。

肯尼思·华尔兹

2012年2月

2001 年版序言

自我撰写题为《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中的人、国家以及国家体系》(Man,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System in Theories of the Causes of War)的博士论文至今,已经过去几乎五十年的时间。时隔多年,回忆书稿的缘起和发展历程不失为一件乐事。

在 1950 年,当我和我妻子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我把所有学术时间均用于完成两项紧迫的任务:决定我学术生涯命运的为时两个钟头的口头答辩;尽量拖延军方的征召令,以便我能够亲眼见证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呱呱坠地。截至 1951 年 4 月,我已经完成了对我的副修专业——国际关系——的准备工作,并计划利用余下来的数周时间对我的主修专业——政治学理论——进行最后的复习。在这一时刻,我得知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教授——国际关系专业的主要答辩教授——由于身患重病,将无法继续参加国际关系专业副修学生的答辩委员会。于是,我申请由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教授代替佩弗教授,并根据佩弗教授的习惯解释道:我们(我和佩弗教授)已经达成一致,我将专注于某些议题,例如帝国主义和欧洲外交史,并将大部分其他议题(例如国际法与组织)束之高阁。在与无所不知的院系秘书伊迪斯·布莱克(Edith Black)通话之后,我得知上述这种处理方式实属司空见惯。然而,福克斯教授却以亲切的口吻告诉我:事实上,当你对国际关系领域加以考察时,你应该全面覆盖该领域,而不应将其析分为许多不同的部分,从而仅仅关注其中少数几个议题。

在这种情势下，我本可以将答辩推迟至当年秋季，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据说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未能通过口头答辩。然而，等到秋天来临，我就将重返军营了。研究生们根据福克斯教授的著作《超级大国》（*The Superpowers*）——该词汇被用于命名一个时代——将他称为“超级大国福克斯”（Superpower Fox）。为此，我和我妻子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涉及国际关系领域中无可回避的权力概念的书籍。

当我试图囫圇吞枣地阅读包罗万象的各种文献时，上述文献的作者彼此对立的观点令我深感困惑，亦即尽管他们所讨论的显然是同一个主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甚至往往截然相反的结论。我该如何理解这些文献呢？当我某一天静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Butler Library）的时候，一个灵感突然在我脑海中闪现。在一张现在已然泛黄的纸页上，我匆忙记下了我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用于分析的三个层次。我终于发现了这样一个线索，它能够让我将那些关于该主题的难以驾驭的材料加以组织，并在脑海中将它们予以稳妥的编排。

在弗吉尼亚的李堡（Fort Lee）消磨了四个月的时间之后，我草拟了一份博士论文的提纲。提纲的内容大约有15页纸，涵盖了从乌托邦主义到地缘政治学再到可能的人口爆炸等一系列理论，并且全都符合三层次分析模式的模式（tripartite format）。我将提纲发给了福克斯教授，随后，当我向陆军请假呆在新泽西州北部的时候，我去拜访了他。他对提纲的评价是：该提纲也许有助于我在日后教授的某门课程。在此期间，他建议我应该花上一天的时间再写一份三到四页的论文提纲。而我则遵命行事。时隔数周，我在韩国收到一封信，告知我尽管系里的终身教授们无法理解我计划撰写的论文主题，但是他们同意我继续论文的写作。

在1952年的秋天，我重返纽约市，尽管我已经得到一个教职，但是这一时间对于从事教学工作已经太晚了。幸运的是，福克斯教授——那时他刚刚升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所长——为我提供了一个在该所担任研究员助理的职位。我将一半时间用于论文的写作，另一半时间则用于修改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的书稿。该书稿堆积在研究所的案头，足有9英寸厚。在1954年的春天，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同时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国际政治

课程的教学；在当年夏末，我将瓦格茨的书稿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的体例。¹五年之后，我的博士论文以《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为题得以出版面世。

以上便是对本书缘起的描述。下文则是对本书实质内容的反映。在写作的最初阶段，对于假定的、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后果的主要根源，我使用了“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这一术语来标定其位置。在我妻子的劝说下，我改用了“意象”(image)这一更为精确也更为优雅的术语。之所以说它更为精确，是因为如果从(分析)层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很容易使人陷入这样一种误解，即对某一层次的选择只不过是一个貌似切合主题并且符合某人想象的问题。“意象”也是一个更好的词汇，其原因在于，尽管分析性的思维方式(analytic thinking)适于解读某些国际政治问题，但是要对国际政治形成更为广泛的理解，则需要系统的分析方法(systemic approach)，而这一分析方法会立即使我们关注第三种意象所具有的影响，并使我们能够理解所有的三个“层次”。

“意象”一词意味着我们在头脑中会形成一幅图画，意味着人们是通过某种既定的方式来观察世界的。“意象”是一个恰当的术语，其原因首先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直接“看到”国际政治；其次在于，要发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描绘出一个相关的活动领域。“意象”一词还意味着，为了解释国际政治后果，我们不得不将一些要素予以滤除，以便集中关注我们所认为的那些基本要素。通过将第一和第二种意象与第三种意象相联，我将第三种意象视为“国家行为体系”(the framework of state action)，以及“一种关于国家体系本身所具有的限制作用的理论”。²解读国际政治后果需要人们对国家所处的环境以及各国自身的特性加以审视。³

对于那时我所称的“国家体系”(state system)，在后来我将其更为精确地定义为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严格来说，《人、国家与战争》一书并未提出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然而，该书的确为这样一个理论奠定了基础。该书发展了一些概念，确定了一些问题，而这些概念和问题始终是学者和决策者的主要关注。作为本书篇幅最长的一章，第四章对“民主和平论”(the democratic peace theory)的立论基础进行了审视，并对其正确

性提出了质疑,“民主和平论”是一个错误的称谓,因为它只是一个观点,或是传说中的事实,而并非理论。我对信奉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信奉不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interventionist and noninterventionist liberals)加以了区分,并对前者的倾向中所潜伏的危险提出了告诫,而这一告诫现在屡屡被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所忽视。毕竟,声称为和平而战,是最为高尚的发动战争的理由,而如果民主政体是一种和平的国家组织形式,那么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而采取的一切手段就都是正当手段。为了实现克林顿政府“促进民主”的目标而可能采取的种种手段,令信奉不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寒而栗。通过以第三种意象挑战第二种意象,并借助于让·雅克·卢梭的权威,我对“民主和平观”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在无政府状态下,期待任何形式的国家都能够和平相处,将需要所有的国家都一致且永久地成为十全十美的国家。

长久以来,美国人都坚信他们的国家是在海外推进普世价值。这一信念导致了以下两个后果。首先,当美国为了维持均势而采取行动之际,例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冷战中与苏联对抗,为其政策的正当性所作的辩护并不是基于权力政治的角度,而是声称为了加强世界自由力量和促进民主事业。其次,美国人很难相信其他国家会厌恶和害怕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拓展影响力和增强控制力。美国人也很难相信,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权力优势会令置身于这一优势阴影下的其他国家忧心忡忡,即便该优势是与善意相伴。《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解释了均势的形成是由于所有国家所处的环境,而非由于人或者国家的邪恶。⁴

国家维持均势的倾向植根于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其他的行为举措和关注也根植于此。战争也许会在当下爆发,其原因却在于某国担心目前令它满意的均势也许会在未来失衡,从而对该国不利。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一个拓展的案例,表明所谓的“未来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future),以及那些往往被认为可以促进国家间合作的事物,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诱因。⁵而且,冲突的发生与其说源自人或者国家的性质,毋宁说源自社会行为的性质。⁶冲突是竞争的副产品,也是为合作所作的努力的副产品。在一个自助体系内,由于预期会发生冲突,国家不得不关注为了维持和保护自身存在所需的各种手段。竞争越激烈,国家

谋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愿望就越强。⁷

《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持久的生命力证明了国际政治的延续性。近数十年来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未触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因此本书的适用性依然存在。一系列引起重要关注的问题——均势政治的盛行、三种意象中某一意象所确定的力量具有的因果重要性,“未来的阴影”所具有的影响,相对收益(较之于绝对收益)的重要性——将继续得到国际政治学者的关注。

注 释

1. *Defense and Diplomacy*(New York: King's Cross Press, 1956).
2. 参见本书第 182 页。
3. 参见本书第 132 页。
4. 特别参见本书第 156—172 页。
5. 参见第五章,特别是第 103 页及以下。
6. 参见本书第 131 页。
7. 参见本书第 155、177 页。

1959 年版序言

本书内容反映了我对国际关系的一个直接关注的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中一个我长期以来深感兴趣的议题。后者可以追溯至我在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求学的那段时光,在约翰·刘易斯和尤尔特·刘易斯(John and Ewart Lewis)教授夫妇的指导下,我体会到了理论研究的魅力,理解到了理论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此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又幸运地成为现在已然过世的弗朗茨·纽曼(Franz Neumann)教授的学生,作为一位教师,他所拥有的杰出才华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忘怀。

我要对威廉·福克斯(William T. R. Fox)教授致以最直接和最深切的谢意。从第一份笼统的文稿提纲的草拟,直至此处最终书稿的确定,福克斯教授始终乐于提出他的建议,以及富有洞见的批评意见。此外,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Studies)的所长,他也允准我将多个夏季以及学年中的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在他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成为一本更好的著作,但是这一说法并不足以说明福克斯教授对本书的贡献,因为,倘若没有他的鼓励和忠告,根本就难以有本书的面世。

我异常幸运地还拥有另一些批评者:赫伯特·迪恩(Herbert A. Deane)和约翰·斯图尔特(John B. Stewart),他们两位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W. Thompson)先生。他们每一位都曾在书稿准备过程

中的不同阶段通读了全文，对此我深表感激，而斯图尔特教授则在两个不同阶段耐心地阅读了文稿。他们都向我提出了很多建议，帮我纠正了许多错误之处；更为重要的是，促使我对文稿的许多内容予以重新思考，甚至常常重写某些章节，尽管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总是能够为他们所接受。

我妻子所做的工作远远不止于让孩子们保持安静和修改句读，也不止于提出批评意见和校对文稿。她完成了某一章主要的研究工作，并为全书的撰写贡献了大量的观点和信息。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它对一位缺乏经验的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表示了理解，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对其他作者相关著作的摘引往往更精准地表达了我个人一些无法恰当表达的想法。我为此免费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在此我要感谢下述出版社惠允我引用那些受到版权保护的著作：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撰写并由“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的《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让·雅克·卢梭撰写、C. E. 沃恩(C. E. Vaughan)翻译并由“警官有限公司”(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出版的《通过欧洲联盟实现永久和平》(*A Lasting Peace through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让·雅克·卢梭撰写、G. D. H. 科尔(G. D. H. Cole)翻译并由“E. P. 达顿有限公司”(E. P. Dutton and Company Ltd.)出版的《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撰写并由“威廉·莫罗有限公司”(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以及《时刻做好战斗准备》(*And Keep Your Powder Dry*)；T. H. 皮尔(T. H. Pear)编辑并由“哲学图书馆”(Philosophical Library)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Peace and War*)；以及奥托·克莱伯格(Otto Klineberg)撰写并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出版的《影响国际理解的紧张局势》(*Tension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肯尼思·华尔兹

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1959年4月

目 录

推荐序 / I

中文版前言 / V

2001 年版序言 / VII

1959 年版序言 / XIII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第一种意象：国际冲突与人类行为 / 14

第三章 第一种意象的一些含义：行为科学与
减少国家间的暴力 / 35

第四章 第二种意象：国际冲突与国家内部结构 / 65

第五章 第二种意象的一些含义：国际社会主义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 99

第六章 第三种意象：国际冲突与国际无政府
状态 / 125

第七章 第三种意象的一些含义：经济、政治和
历史的例证 / 148

第八章 结论 / 177

参考文献 / 189

第一章 导 论

曾有人言道：询问是谁赢得了某场战争，就仿佛在询问是谁战胜了旧金山地震。在 20 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一命题，即在战争中不存在真正的胜利者，而只有程度不同的失败者。然而，战争是否也与地震一样，是人类智慧所无法控制和消除的自然现象呢？虽然很少有人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无论人类怀着如何高尚的理想，如何孜孜以求地试图消除战争，却依然只能赢得国家间转瞬即逝的短暂和平。努力与成效、愿望与结果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失衡。我们被告知，苏联人民对和平怀有强烈而深切的渴望，同时我们可以确信美国人民也拥有同样的渴望。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慰藉，然而，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以及国际政治的现实，我们却很难相信这一渴望能够创造出我们所企盼的和平状态。

社会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现实与历史是如此密切相联，而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是如此紧密，因此当他们在评估拥有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的可能性时，往往倾向于抱持保守的态度。如果有人询问：在曾经烽烟四起的百战之地，我们现在能否拥有和平？对该问题最为常见的答案往往是悲观的。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事实上，倘若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提问，在某种程度上答案将不会那么令人沮丧，即：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够减少战争爆发的频率，而增加和平的机会？未来我们能否比过去拥有更多的和平时刻？

和平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一系列目标之一。寻求和平的方式方法也多种多样。对和平目标的追求以及相应手段的应用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